



留学日本
丛书

丛书主编/朱建荣

副主编/苗丹国 朱慧玲

监修/日本华人教授会议

(第一卷)

大潮涌动：

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

SURGING TIDE

Study in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the Opening-up

主 编/廖赤阳 副主编/李恩民 王雪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留学日本
丛书

丛书主编/朱建荣

副主编/苗丹国 朱慧玲

监修/日本华人教授会议

(第一卷)

大潮涌动：

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

SURGING TIDE

Study in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the Opening-up

主 编/廖赤阳 副主编/李恩民 王雪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廖赤阳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

(留学日本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1547 - 5

I. ①大… II. ①廖… III. ①留学生 - 学生生活 - 研究 - 日本 IV. ①G64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0410 号

· 留学日本丛书 · 第一卷

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

主 编 / 廖赤阳

副 主 编 / 李恩民 王雪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国际出版中心 (010) 59367197

电子信箱 / guoji@ssap.cn

项目经理 / 仇 扬

责任编辑 / 郭荣荣

责任校对 / 赵士孝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 字数 / 324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547 - 5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留学是回顾历史面向未来的一面镜子

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东方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有史以来直到昨日今天，两国之间一直有着频繁的交往。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表述：“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 1894 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日两国又经历了 20 多年政府间关系断绝的对立状态，直到 1972 年，才恢复邦交，1978 年又签订了友好条约，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交流从此走上正常的轨道。进入 21 世纪后，两国领导人又达成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协议，双方的交流合作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和密切程度。现在两国之间又在筹划建立 21 世纪新型的全面合作。2009 年 10 月 10 日，鸠山由纪夫就任首相后首次访华，温家宝总理在会谈中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克服了困难和曲折，进入了全面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发展中日关系对两国、对亚洲、对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双方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亚洲和全球的角度审视和把握中日关系，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加大战略投入，全面加强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① 1972 年 9 月 25 日在欢迎田中首相访华国宴上的致辞。

中日关系历经风雨，迎来了今天的健康发展，这是值得两国人民庆幸的事，但我们不应止步于此，中日两国之间还存在进一步扩大合作、对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共同作出贡献的空间和巨大潜力。而面向未来，我们更需要历史的经验和智慧。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在了解、总结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基础上，为今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拓宽和跃升多提供一些历史经验的启示，找到更多有建设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丛书既是在客观地重现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段历史，也是在为未来的两国关系提供一面镜子。

从A国到B国留学，并不意味着两国在人种民族或文化上存在优劣高低，而主要反映了两国之间在一定阶段内发展势头的不同以及一方是否愿意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另一方是否愿意接纳帮助别人。历史上，日本曾有不畏路途艰难到中国来留学的“遣隋使”、“遣唐使”；明治维新时，日本又派出以岩仓具视为团长的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近一年，由此下定了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有大批留学生去欧美，使他们在战争废墟上再次以“和魂洋才”的精神参考欧美经验重建经济大国。对于日本民族这种好学和勤奋的精神，胡锦涛主席于2008年5月访日时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如此描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努力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国土资源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日本在制造业、信息、金融、物流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这是日本人民的骄傲，也值得中国人民学习。”

而在世界潮流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实行明治维新时，中国仍然故步自封，停留在“天朝大国”的历史幻影中，只有少数精英摇旗呐喊，和者盖寡，推行的改革受到重重限制，收效甚微，因而走向衰落，与日本的崛起形成鲜明的对照。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政府的惨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告终。现在看来，这是已经没落的中国封建制度被宣判死刑的既残忍又无法逃避的结局（虽然清朝寿终正寝还要等到十几年后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险遭列强瓜分的“命运的沟底”，同时，它又是中华民族警醒并重新奋起的转折点。

就在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清朝政府决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里既有清朝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做表面文章的一

面，也有大量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中国精英志士主动到日本求学的一面，显示出中国的精英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产业文明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潮流，而日本是亚洲吸取西方经验最好最成功的国家，所以要留学日本，向日本学习改革经验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留日期间写的日记里这样表述了他对留学日本意义的体验：“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

此后，几乎影响 20 世纪中国所有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蒋介石、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都曾赴东瀛求学，孙中山等则以日本为革命据点。他们从日本并通过日本，学到了大量近代文明的原理，并以日本为参照物，力图改革中国的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制度。可以说，20 世纪前期，既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膨胀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志士虎口夺食，以日本为师为鉴从事祖国振兴的过程。

1937 年中国对日抗战，留学生几乎全部回国（除了少数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籍学生以及所谓“满洲国”的留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之间没有政府间邦交的关系又持续了 20 多年。1972 年两国恢复政府间邦交，之后少数公派留学生开始登陆日本，而大量的留学生再赴日本，形成第二次留日高潮则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以后。

近 30 年，中国大量留学生来到日本，日本成为中国学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留学对象国。这个过程中交织着各种复杂的因素。日方从政府到民间，真心地帮助中国留学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主流。他们作为个人也许各自的主观意愿有所不同，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战争的反省和对华的“赎罪意识”，真诚希望与日本在文化上有渊源关系的中国能够振兴，能够与日本长期友好合作。也有少数人是出于一种优越感，或者说是将中国看作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对象而有一种心理上的自信。还有人认为要培养“知日派”乃至“亲日派”（持这一观点的人们在近几年中国迅速崛起之后就对招收中国留学生不那么热心甚至提出要加以限制了）。而中国方面自 1970 年代末开始向日本公派留学生时，也有着复杂的心态：既希望从日本学到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又担心留学生在外边受到“精神污染”。不过大的背景是中国越来越走向开放，到国外，包括到日本的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而且除了公派以外，自费留学生也大量增加。留日学习的学科领域越来越广、专业程度也越来越深。近 20 年里，在日本各大学和研究单位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是所

有各国留学生里人数最多的，比例估计达到5~6成。可以说，日本下大力气招收培养外国留学生，无论对于留学生接受国还是派遣国，其社会、经济、文化效应都是双赢的。其中受益最大的应该说还是中国。而中国国内越来越走向开放的机制，使得中国的留日学生与其他各国和地区的留日学生相比，学成回国后对国内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也是最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留日高潮，是促进中国国内经济科技全面崛起、视野拓宽、对日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重要因素之一。

回顾历史与现状，我们可以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意义作三点概括。

第一，留学日本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综合国力上升、观念变化的过程成正比的。

第二，留学日本既是反映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系近现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第三，留学日本是人员、知识、观念与文化的跨国移动，成为联系中日两国民间交流、人际关系网络与文化知识传播、观念转变的重要纽带。

我们认为，研究这一课题，还有几个现实意义和对未来的意义。

①对于多达一二十万的留日学子（包括学成回国的和留在日本的）本人及其家属近亲来说，留日既是记录他们每个鲜活生命历程的“自我史”与“个人史”，也是承载这个群体的“普遍史”和“时代史”。

②在思考分析当代中日关系及其走向时，不能忘记这批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留学日本的人员的存在。在日本，有包括我们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在内的多个社团组织，正在中日交流中积极地发挥着桥梁作用。而在国内，留日归国者或是在社团组织中，或是在各自的行业里，辛勤耕耘、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各种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又和他们的日本留学经验有关。

③在思考中日关系的今后走向，审视中国全面崛起后的发展思路时，可以从留学大潮中找到不少启示。比如，虚心学习、不过于设限设防、信任尊重留学生等。另外，曾经的留学生有不少人在回国后已经成为国家各行各业的栋梁，也有不少人留在日本并进入了主流社会。通过留学大潮所产生的这些新的交流渠道和纽带，是推动今后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们编写这套丛书，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第1卷《大潮汹涌：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主要以“改革开放30年与留学日本”这一宏观大局为对象，内容上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为

主，由于兼有丛书总论的性质，所以也包括了留学归国人员以及对 30 年间总体状况的概括和基本数据的统计。

第 2 卷《跨越国境：从留学生到新华侨》。记录新时期留日学子的奋斗历程与日本新华侨社会的成长轨迹。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留学人员在日的学习、生活以及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留学生和在日华人对日本社会、中日关系和中国与世界的贡献和影响。

第 3 卷《时代召唤：中国的崛起与归国留学生》。叙述留日学子归国服务、报效祖国的心路历程。主要以改革开放后的留日归国人员与中国社会变迁为对象，介绍、分析留日归国人员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贡献。

第 4 卷《历史回声：百年探索与奋斗之路》。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并展望未来。重点放在清末以来的留学日本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日关系、中国与世界的贡献上，也可以上溯到明治以前的中日关系。

希望读者能够支持我们的丛书，并提出宝贵意见。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代表、留学日本丛书主编 朱建荣

留学日本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朱建荣

副主编 苗丹国 朱慧玲

监修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

《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 编委会

主编 廖赤阳

副主编 李恩民 王雪萍

本卷编委 王雪萍 朱建荣 沈国威 李恩民
廖赤阳

第一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留学政策： 建构、调整与变迁	苗丹国 杨晓京 / 001
第二章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留日预备校	李东翔 / 025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留学政策的转型	王雪萍 / 032
第四章	1978 年以来的自费留学政策及其影响	李 昱 / 049
第五章	赴日留学生的摇篮：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 预备学校	李若柏 郑国爱 / 064
第六章	日本研究专家学者的摇篮：“大平班”	沈国威 / 079
第七章	公派留学生的日语教育	松冈弘 李恩民 译 / 088
第八章	与第一期国家公派赴日留学本科生的 邂逅及交流	竹内诚吉 邢丽荃 译 / 109
第九章	日中留学交流的启动阶段：回顾与 展望	光田明正 邢丽荃 译 / 118
第十章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中的 人才培养事业	冈田实 中里太治 彭秀卿 译 / 130
第十一章	留日同学会及各地留日学人组织	于隶群 / 154
第十二章	新时期留日归国学者的社团组织及其网络	廖赤阳 / 164
第十三章	中日留学生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刘金钊 / 196

第十四章 1978 年以来中国人留学日本状况研究

..... 苗丹国 王雪萍 / 206

附录一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大事记

(1978 ~ 2009) 苗丹国 王雪萍 编 / 232

附录二 中央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千人计划”)大事记 苗丹国 王雪萍 编 / 268

附录三 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相互承认学位、

学历和文凭协议情况一览表 (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

..... 苗丹国 王雪萍 编 / 271

附录四 中国地方政府印发鼓励和吸引留学人才

政策大事记 苗丹国 王雪萍 编 / 273

附录五 改革开放以来赴日中国留学生统计 (1978 ~ 2009)

..... 李恩民 编 / 281

编著者简介 / 285

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留学政策： 建构、调整与变迁^{*}

苗丹国 杨晓京

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走过了辉煌和坎坷的历程，出国留学政策日臻完善，并始终与社会的进步、公民的意愿、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成熟紧密关联。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断扩大派遣公费留学人员和不断放宽自费留学限制的政策，出国留学与留学回国两组政策体系相得益彰。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对出国留学活动的走向起到了指导和引领的作用，同时，社会环境、国际形势以及留学活动的实践又对留学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将要摆脱停滞不前的困局，将要逐渐形成全方位恢复和发展的新局面。回顾与研究 30 年前出国留学政策的形成与调整之过程，对留学政策的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 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

1. 国内社会背景

留学教育政策的出台都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一定的政治环境是社会内部整合与发展所必需的“上层建筑”，它制约并影响着包括出国

^{*} 本文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政策的形成与调整》（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一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

留学政策在内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国这一时期的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出台和调整，也是与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等大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从1977年3月起至1980年代初，全国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做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这是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前奏，促成了思想大解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1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并通过相关决议，提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往‘左’的错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同时确定了“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中国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一些“左”的错误。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已经不合时宜的口号，实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对外开放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的形成与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过程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国内条件已经具备，并已实际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时期。

邓小平在1978年9月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论述，加速了新时期出国留学政策的形成和调整，开辟了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工作的广阔前景。

2. 国际社会背景

自1972年中国对外关系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发展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在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1978~1980年，中国先后实现了中美建交和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苏关系也从战略对峙到出现缓和。对苏联政策的调整无疑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较多的谈判筹

码，并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①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与国内形势逐渐向有利于中国方面好转。中国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中国的建交国数量稳步增加，中国开始大批量引进欧洲和日本的技术设备，中日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美国面临着丧失中国市场的威胁，中美两国领导人对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担心，也加快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上述背景下，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近30年的不正常关系，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反响。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成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访美的中国领导人，备受世界舆论关注。中美关系在短时间里迅速超过了仅仅是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在发展两国间科技、教育、文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前的9.92亿美元，增长到1983年的44.8亿美元。在反对霸权主义和世界战略问题上建立了交换意见的平台，初步形成了在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方面展开友好合作的新格局。^②

其间，中国国家领导人相继出访了日本、美国以及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至1982年底，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到125个，其中不仅有发展中国家，还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外交活动，不仅奠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并且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③1978年前后国内政治和国际条件的历史性变化，不仅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系统恢复与快速发展。

二 邓小平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性意见

实际上，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的1~2年内，即到1978年上半年，中国教育对外交流领域，仍然处在一个“小步慢走”的状态。在经过多年的思想与政策的禁锢之后，一些人对于扩大开展出国留学事务依然

① 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08~209页；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2005，第208~209页。

② 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第82~87页；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19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47页。

持有比较谨慎和左右观望的态度，致使出国留学政策徘徊不前、发展缓慢。

1978年6月23日下午，已于1977年7月恢复了党内外职务并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以及蒋南翔等国家和部委领导人，与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等该校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其间，邓小平表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怕接触社会，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这是五年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国外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好办法……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今年派三千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邓小平在此次座谈会的发言，实际上是批评了当时国内的留学生派遣政策过于保守，他说：“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①

在谈到恢复和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科学和教育工作时，邓小平也曾多次表示过，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还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派人出国留学“是一项具体措施”。^②

邓小平的上述意见，使中国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大门被快速打开，制定全方位扩大派遣公费留学人员政策的基础由此奠定起来。中国政府决定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家财政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量外汇，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大批公费留学人员。据此，有关职能部门根据留学人员的特点与状况，研究和制定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出国留学事务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和管理规定，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经验已经显示出，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下，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事务是一个较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主要包括人员选拔、国内培训、国别派遣、国外管理和学成回国等诸多政策环节。在国家领导人的指导下，通过教育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在从1978年开始的3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

① 李涪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365～366页；李琦文：《赴美谈判留学生问题始末》，《神州学人》1998年第6期，第14～1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8、57页。

派遣公费出国留学人员 6800 多人，即从 1978 年一年只有几百人的派出规模，迅速增加到 1981 年一年内派出近 3000 人。增幅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并令世人瞩目。在实行扩大派遣公费出国留学人员政策的同时，服从于中国外交方针的中国出国留学政策体系也不断得到修复与完善，服务于新时期出国留学人员的管理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为其后持续 30 年之久的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活动打下了基础。

三 出国留学政策的再度确定与大量派遣 公派留学人员政策的实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中国教育部修改了原定的派遣原则，并迅速确定了新的公派出国留学的选派方针、派出规模、选拔办法和遴选条件以及选派国别、专业分配、管理办法等政策原则。总的政策原则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力争多派”；二是派出人员以进修生和研究生为主；三是着重于开拓派出渠道，各个单位亦可派出留学人员。

1. 教育部于 1978 年 7 月提交《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落实“扩大派遣”意见

为落实邓小平副主席 1978 年 6 月 23 日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遣留学生的意见，教育部于仅仅 18 天后的 1978 年 7 月 11 日，即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① 制定了与“扩大派遣”意见相一致的一系列政策原则。

上述报告提出，每年拟按大学生、进修生和研究生三种类型派出留学生，每年选拔 5000 ~ 6000 人，实际派出 3000 人。其中大学生占 60% ~ 70%，进修生占 15% ~ 20%，研究生占 15% ~ 20%。今后拟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学生（本科留学生）拟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在校生及大学一年级在校生中选拔；进修生由各部门按规定的条件，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中选拔；（留学）研究生从当年已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年龄上的政策要求为，大学生一般在 18 岁以内，最大不超过 20 岁；研究生一

^① 国家教委外事司编著、陈可森执笔《教育外事工作历史沿革及现行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 37 ~ 38 页。

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太死。留学派往国家要根据“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和有关国家可能接受留学生的情况，有重点、有目的、有选择地派出。当时有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20个国家可以考虑选择。派出渠道拟采取官方、民间（包括友好人士和院校之间直接联系）等多种形式。所学专业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同时派出一些语言留学生，并适当安排一些学习科技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主要是历史、教育学、心理学）的留学人员，以适应国家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学校新建专业及长远规划的需要。在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选择所学专业时应本着“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派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人员占派出3000人总数的85%，其中理科占30%，工科占35%，农科占10%，医科占10%；派出学社会科学的留学人员占15%，其中语言类留学人员占7%，科技及经济组织管理类留学人员占4%，其他占4%。另外，该报告还就留学生出国前和出国后定期回国学习的安排以及留学生管理机构等有关问题提出了意见。

2. 对“从高中生中大批选拔并派遣为本科留学生政策”的异议

1978年7月31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教授康寿万致函邓小平，对大批派遣大学生出国学习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还是个穷国，合理使用宝贵的外汇是很必要的。在美国培养一个大学生所花的钱，在国内可以培养20个大学生。如果美国大学毕业生水平确比国内高，多花点钱当然也值得，但事实并非如此。为此，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于1978年8月12日给邓小平副主席、方毅副总理提交了报告；教育部也于8月18日提交《关于派遣出国留学工作的几点请示》，^①认为派遣大学生出国学习仍应适当选派，但规定的70%的比重太高了，原则上应该降下来。鉴于当时高校还在整顿和恢复的过程中，学科还很不全，招生量也有限，如果能在最近3~5年内利用外国的大学为中国多培养一些大学毕业生，有利于争取时间，较迅速地充实和壮大中国科技和教师的队伍，尽快加强新兴学科等薄弱环节，扭转目前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了搞好派遣大学生的工作，上述请示还提出了“派出少量大学生进行试点；聘请外籍教师在国内对出国预备生进行集中语言培训；出国预备生在集训期间切实有效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及加强驻外使馆对留学

^①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369~372页。